
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孝经郑注疏

〔清〕皮锡瑞 撰

吴仰湘 点校



中华书局

中 | 华 | 国



孝经郑注疏

〔清〕皮锡瑞 撰

吴仰湘 点校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孝经郑注疏/(清)皮锡瑞撰;吴仰湘点校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6.7

(中华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101-11928-2

I. 孝… II. ①皮…②吴… III. ①家庭道德-中国-古代②《孝经》-注释 IV. B823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4637 号

-
- 书 名 孝经郑注疏
撰 者 [清]皮锡瑞
点 校 者 吴仰湘
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
责任编辑 朱兆虎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5 $\frac{3}{8}$ 插页 2 字数 110 千字
- 印 数 1-8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928-2
定 价 20.00 元
-

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的出版缘起，要从九十年前说起。

1920年，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，开始编纂《四部备要》。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，精选经史子集的“最要之书”，校订成“通行善本”，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。一经推出，即以其选目实用、文字准确、品相精美、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、阅读典籍的需要，广受欢迎。丛书中的许多品种，至今仍为常用之书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。六十馀年来，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，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，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，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，为学界所必备。

同时，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，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——国学，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。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，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，普惠全人类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。当此之时，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，实为当务之急。于是，《中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应运而生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是我们追慕前贤、服务当代的产物，因此，它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：

一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“最要之书”。举凡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科学、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，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，皆在此列。

二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“最善之本”，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。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，如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，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。总之，不以新旧为别，惟以善本是求。

三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以新式标点、简体横排刊印。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。时至当代，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。《文库》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，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将逐年分辑出版，每辑十种，一次推出；期以十年，以毕其功。在此，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、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。

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，至今已近百岁。我们将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，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、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

民敬献的一份厚礼。我们自当努力,让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得起这份重任,这份荣誉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0年12月

点校说明

汉书艺文志说：“孝经者，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。夫孝，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行也。举大者言，故曰孝经。”孝经虽在六经之外，汉人却极为重视，以至将孝经与春秋并称，看得比他经更重，“盖以诗、书、易、礼为孔子所修，而春秋、孝经乃孔子所作也”（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），可谓尊崇至极。汉世所传孝经，有今文、古文之分，董仲舒、后苍、张禹、郑众、马融、郑玄、何休等名儒各有注解。另有托名孔安国的古文孝经传，始见于魏晋之际。其中郑玄所注今文孝经，东晋至唐初几度立学。虽然南齐陆澄公开诘难孝经郑注，隋唐又有陆德明、孔颖达等随声附和，但郑注一直与孔传并行于世。唐玄宗开元七年（七一九），诏令群儒详定郑注与孔传短长，刘知几立十二验，指孝经非郑玄所注，主张“行孔废郑”，而司马贞摘驳孔传之谬，要求郑注与孔传“依旧俱行”（孝经注疏孝经序）。数年后，唐玄宗以孝经旧注“踳驳尤甚”，自作新注，令元行冲作疏，立于学官，“御注既行，孔、郑两家遂并废”（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）。北宋真宗咸平四年（一〇〇一），邢昺受诏校定各经疏，对元疏略加剪裁，纂成孝经注疏，列入十三经注疏，从此代代传习，郑注

本、孔传本渐次佚失。清儒复兴古学，对孝经郑注大加搜辑，又从日本传回孝经郑注和古文孝经孔传，再次激发孝经两种传本真伪之争，推动孝经研究回到两汉。皮锡瑞的孝经郑注疏，由此应运而生。

皮锡瑞（一八五〇—一九〇八）字鹿门，一字麓云，湖南善化人，曾自署居室曰“师伏堂”，后学尊称“师伏先生”。皮锡瑞于光绪八年（一八八二）举顺天乡试，后四处礼闱报罢，以讲学、著述终老。他幼怀经世大志，后因科场失意，“穷而遁经”，专究尚书，兼攻郑学，晚贯群经，创发大义。皮锡瑞一生撰述宏富，经术湛深，虽宗主今文，但治学谨严，持论平实，在学界享有盛誉。

皮锡瑞从事孝经研究，始于光绪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岁暮。他在研读孝经注疏时，感到清儒对孝经研究不够，因此纂辑孝经古义，从中发觉孝经郑注的价值，嗣经叶德辉焕彬启发，萌生疏解孝经郑注之念，翌年正月即着手工作，如师伏堂日记正月初四日载：“阅孝经及王制注疏，知孝经皆今文说，郑注孝经皆从今文，故与诸经注引周礼、从古文者不同。浅人不知郑学不专一家，乃误疑其非郑注矣。”廿三日、廿四日相继记载：“录陈仲鱼所辑孝经郑注，以较玄宗御注，见其于郑君所引故实，如三老五更、三公四辅、世子迎侯之类皆去之，而取其空言虚辞，足征弃实取虚之风已始于唐人，不自宋儒始也。”“以释文较陈仲鱼所辑孝经郑注，中有遗脱，亦有讹误，足征著书之难。”廿九日又载：

“焕彬至，携所增辑严铁桥孝经郑注本，较陈本远胜之。”皮锡瑞甫下手即有三点发现：一是从孝经注疏和王制注疏的对读中，悟到孝经及郑注均属今文之学，为反驳前人对孝经郑注的疑难找到突破口；二是经过对比郑注与御注，察觉二家一实一虚、此优彼劣，体会郑注详于典礼、征实不诬的特点，所以后来主要用力于郑注所引典礼的疏通证明；三是比较陈鱣和严可均的孝经郑注辑本，确定严本远胜陈本。他从叶德辉处借抄严本后，即集中精力作疏，至四月十二日完成初稿，续经修改，于五月初三日撰孝经郑注疏自序，全稿告竣。

孝经郑注疏自序开篇说：“学者莫不宗孔子之经，主郑君之注，而孔子所作之孝经，疑非孔子之旧；郑君所著之孝经注，疑非郑君之书，甚非宗圣经、主郑学之意也。”释疑解难，为孝经及郑注作辩护，成为皮锡瑞作疏的旨趣。

前人特别是宋儒因孝经开篇有“仲尼尻”三字，书中屡有“子曰”，各章又引诗、书，怀疑孝经非孔子作，乃曾子门人或汉儒纂辑而成。皮锡瑞指出：“古人著书，必引经以证义，引礼以证经，以见其言信而有征。孔子作孝经，多引诗、书，此非独孝经一书有然，大学、中庸、坊记、表記、缁衣莫不如是。”他承丁晏孝经征文之绪，在疏证各句经文时，“更采汉以前征引孝经者附列于后，以证孝经非汉儒伪作”。全书征引遍及五经传记、诸子和两汉文章、诏令、奏议、经注、经说，凡与孝经文字相同或语意相近的文句，搜

罗殆尽。这些材料虽不足以证明孔子作孝经，却充分证明孝经必是先秦旧籍，绝非出自汉儒。

前人怀疑孝经郑注的一大理由，是认为汉、晋以来官私记载未明言郑玄注孝经，如刘知几之伦，清儒对此屡有反驳，但断案甚非易事。皮锡瑞在孝经郑注疏卷上“郑氏解”题下，指出“近儒驳刘说，辨郑注非伪，是矣，然未尽得要领”，因而针对刘知几十二验一一辩驳，滔滔千言，力陈“皆不足证郑注之伪，郑六艺论自言为注，无可致疑”。历来的怀疑论者，更指孝经注与郑玄他经注风格不同或持论相异，如陆澄说“观其用辞，不与注书相类”，陆德明说“检孝经注，与康成注五经不同”，孔颖达说孝经注“多与郑义乖违”。对此，皮锡瑞在自序中强调：“郑君深于礼学，注易笺诗，必引礼为证。其注孝经，亦援古礼。”在具体疏证中，他依郑玄以礼注经的风格，援引郑玄三礼注、尚书注、尚书大传注、毛诗笺等，附以孔、贾疏解，以孝经注与之相同、相合或相近，证明孝经注必出郑玄之手。至于孝经注中俯拾皆是的今文家说，与郑玄他经注多从古文歧互，皮锡瑞从他先今后古的学术变化作了解答：“是郑君注孝经最早，其解社稷、明堂大典礼，皆引孝经纬援神契、钩命决文。郑所据孝经本今文，其注一用今文家说；后注礼笺诗，参用古文。陆彦渊、陆元朗、孔冲远不考今、古文异同，遂疑乖违，非郑所著。”

孝经郑注疏的学术成就，主要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对郑

注的补苴和考校。孝经郑注自元明以来佚失，清代余萧客、陈鱣、袁钧、王谟、孔广林、严可均、洪颐煊、臧庸等纷起搜辑，其中严可均依据日本回传的群书治要，与经典释文、孝经注疏等所引郑注参互考订，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辑本。皮锡瑞采用严可均的成果，吸取叶德辉对严本的补充意见，再作了补苴和审慎考校，对严本补阙订讹，使孝经郑注文本更臻完美。二是对郑注的训解和疏证。皮锡瑞在自序中明言：“孝经文本明显，邢疏依经演说，已得大旨。兹惟于郑注引典礼者为之疏通证明，于诸家驳难郑义者为之解释疑滞。”他征引说文、尔雅、释名、广雅等字书和先秦两汉各类文献，对郑注关键字句细作训释，特别是援引各种经传注疏和郑玄他经之注，对郑注所称古义、所指名物、所涉典礼等大加疏通，旁参互证，畅发无遗，“凡社稷、宗庙、丧服、祭享、朝聘、巡狩、郊祀、明堂、辟雍、五等、五服、五孝、五刑诸端，皆原原本本，引据翔实，而以郑君他经之注以证此注，尤得汇通之旨”（马宗霍评语）。此外，皮锡瑞在考订郑注、疏解郑义时，还注意辨析各家注疏与经文的离合，进而考证经文，发明经义。

总之，皮锡瑞承继前贤，撰作孝经郑注疏，通过搜讨文献，补苴残缺，训释字句，稽考名物，疏证典礼，解释疑滞，在尽力还原孝经郑注文本的同时，用心抉发郑注中的今文经说与古制古义，并以郑明经，昌明今文之学。对此，马宗霍在给孝经郑注疏作提要时大加称赞：“郑注湮废已久，严氏粗加理董，

其绪未宏，得锡瑞疏，而后郑君孝经之学于以大阐。”

孝经郑注疏由皮氏师伏堂于光绪乙未（一八九五）年刊行，后收入师伏堂丛书。一九三四年，上海中华书局据师伏堂刻本排印，收入四部备要。此次整理，以师伏堂刻本为底本，参校四部备要本。严可均辑孝经郑注，则据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光绪九年（一八八三）咫进斋丛书本作对检。点校工作中，另有若干事项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皮氏疏证，底本不作分段，今依注疏体例分别提行，以清眉目。

（二）凡底本讹、脱、衍、倒之误，均出校勘记；其显误者径改，并在校记中说明所据。

（三）凡避讳字、版刻混用字如“已巳”等，一律径改，不出校记。

（四）凡皮氏引述文字，全部覆检原书，属于节引、撮述大意及而无碍文义者，不予更动；若有文意歧异或文字讹误者，则出校说明或据以校正。

（五）皮氏之孙皮名振所撰皮鹿门先生传略，和马宗霍、伦明所撰提要，或有助于了解孝经郑注疏及皮氏生平、著述，谨附录于后。

整理经学著述殊非易事，笔者于经学研究又属半路出家，学识简陋，功力不逮，点校中必有舛谬，祈望博雅君子不吝指正。

丙申立夏后五日，吴仰湘谨识于岳麓书院

序

学者莫不宗孔子之经，主郑君之注，而孔子所作之孝经，疑非孔子之旧；郑君所箸之孝经注，疑非郑君之书，甚非宗圣经、主郑学之意也。古人箸书，必引经以证义，引礼以证经，以见其言信而有征。孔子作孝经，多引诗、书，此非独孝经一书有然，大学、中庸、坊记、表記、缁衣莫不如是。郑君深于礼学，注易笺诗，必引礼为证。其注孝经，亦援古礼。此皆则古称先、实事求是之义。自唐以来，不明此义，明皇作注，于郑注征引典礼者概置不取，未免买椟还珠之失，而开空言说经之弊。宋以来尤不明此义，朱子定本，于经文征引诗、书者，辄删去之。圣经且加刊削，奚有于郑注？

今经学昌明，圣经莫敢议矣，而郑注犹有疑之者。锡瑞案：郑君先治今文，后治古文。大唐新语、太平御览引郑君孝经序云“避难于南城山”，严铁桥以为避党锢之难，是郑君注孝经最早。其解社稷、明堂大典礼，皆引孝经纬援神契、钩命决文。郑所据孝经本今文，其注一用今文家说；后注礼笺诗，参用古文。陆彦渊、陆元朗、孔冲远不考今、古文异同，遂疑乖违，非郑所箸。刘子玄妄列十二证，请行

伪孔、废郑。小司马昌言排击，得以不废。而自明皇注出，郑注遂散佚不完。近儒臧拜经、陈仲鱼始哀辑之，严铁桥四录堂本最为完善。

锡瑞从叶焕彬吏部假得手钞四录堂本，博考群籍，信其确是郑君之注，乃竭愚钝，据以作疏。孝经文本明显，邢疏依经演说，已得大旨。兹惟于郑注引典礼者为之疏通证明，于诸家驳难郑义者为之解释疑滞，冀以扶高密一家之学，而于班孟坚列孝经于小学之旨亦无懵焉。辑本既据铁桥，故案语不尽加别白。焕彬引陈本书钞、武后臣轨，匡严氏所不逮，兹并箸之，不敢掠美。更采汉以前征引孝经者附列于后，以证孝经非汉儒伪作，窃取丁俭卿孝经征文之意云。

光绪二十一年岁在乙未仲夏月，善化皮锡瑞自序于江西经训书院。

郑氏序

孝经者，三才之经纬，五行之纲纪。孝为百行之首。经者，不易之称。玉海四十一艺文孝经类。仆避难于南城山，栖迟岩石之下，念昔先人馀暇，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。刘肃大唐新语九。

疏曰：御览卷四十二“南城山”：“后汉书曰：‘郑玄汉末遭黄巾之难，客于徐州。’今孝经序，郑氏所作。其序云：‘仆避于南城之山，栖迟岩石之下，念昔先人馀暇，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。’盖康成胤孙所作也。今西上可二里所，有石室焉，周回五丈，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也。”郑珍曰：“唐刘肃大唐新语云：‘梁载言十道志解南城山，引后汉书云：郑玄避黄巾之难’，至‘盖胤孙所作也’。证知御览此条出于梁载言，其首原有‘十道志曰’四字。太平寰宇记‘沂州费县’下又系钞梁志言，而改末句作‘俗云是康成胤孙注孝经处’，殊失其原。今御览传本脱首四字，竹垞朱氏直以为后汉书，而谓范史无此文，未知为袁山松、华峤之书，抑薛莹之书。脱误之本，惑人如此。齐乘‘南成城’：费县南百馀里，齐檀子所守，汉侯国，属东海，因南成山而名。汉末黄巾之乱，郑康成避地此山，有注

经石室。按：南成，今沂州府费县地，后汉时县虽属太山郡，在兖州部中，以禹贡州域言之，正徐州境内地也。又按：南成属兖部，康成避地于徐，先则陶恭祖以师友礼待，后则刘先主敬与周旋，不知何以又栖迟此山，岂恭祖兴平元年死后，陈宫辈未迎先主，乃暂入山中著述耶？抑初去高密，先寓此山，青州黄巾入兖州，即初平三年四月也，此山于是时且不可避，乃始到徐州耶？无从考定矣。”

锡瑞按：据郑珍说，御览本十道志，志引后汉书止首二句，“今孝经序”以下皆梁载言之语。朱竹垞以为皆后汉书，殊误，郑珍订正，是也，而梁载言之误，犹未及订正。郑注孝经全用今文，当正注纬、注礼之时，与晚年用古文不合。序云避难南城，是避党锢之难，非避黄巾之难。后汉书以为“被禁锢，修经业，杜门不出”。而据郑君自序，实有党锢逃难之事，当是党祸方急，不能不避，后事稍缓，乃归杜门耳。若避地徐州，有陶恭祖、刘先主为主人，不得有栖岩石之事。郑小同注孝经，古无此说。自梁载言以为“胤孙所作”，王应麟遂傅会以为小同。梁盖以孝经郑氏解世多疑非康成，故调停其说，以为康成之孙所作；又以序有“念昔先人”之语，于小同为合，遂创此论。案：郑君八世祖崇为汉名臣，祖冲亦明经学。周礼疏曰：“玄，郑冲之孙。”礼檀弓疏皇氏引郑说，“称郑冲云：小记云‘诸侯吊，必皮弁、锡衰’，则此弁经之衰亦是

吊服也”。皇所引是郑志之文，盖郑君称其祖说以答问。然则郑君之祖必有著述，序云“念昔先人”，安见非郑君自念其祖，而必为小同念其祖乎？郑珍既以小同之说不足为信，又谓康成客徐州已六十六岁，注是晚年客中之作，俟小同长始检得之，则犹为梁载言所惑。其辨南成属兖，非徐，康成在徐有陶恭祖、刘先主，不得栖迟此山，亦明知梁说为不然，特未能尽辟之，则郑君作注之年不明，而小同以孙冒祖之疑，亦终莫释矣。